

中日关系亟须走出“心理调适期”



吴寄南
上海市日本协会会长

山田贤一指出,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部分日本民众在心态上仍未能接受,对中国未来发展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反而从涉华负面新闻中寻找心理安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媒体出于商业考量,过于迎合舆论,只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使民众产生了越发严重的对华恐惧心理。(对山田贤一的采访原载于8月5日本报15版)

避免战略误判

两千多年来,东亚第一次出现中日两强并列的局面,双方都需要漫长而艰难的心理调适。日本100年来形成的对华优越感要纠正并非易事,中国也有一个如何自我定位、提升软实力,以便让周边国家消除疑虑、心悦诚服的课题。走出这一“心理调适期”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日关系固然有暂时转圜、相对缓和的可能,但竞争、对立则是常态,甚至不排除激烈冲突、擦枪走火。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战略误判、确保两国关系基本平稳,应该是双方共同的目标。如果有一天日本朝野上下尤其是掌控权力中枢的政治家意识到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美国不愿为日本流血,继续折腾围堵中国的所谓战略外交又不可能产生积极结果,就会有一些现实、明智的判断。

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听任矛盾对立恶化,导致双边关系继续漂流、停滞甚至倒退,还是仔细寻找和努力扩大有利转圜的积极因素,消除“雾霾”、拨云见天?不同的选择必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心理调适期”多长多艰难,彼此间毕竟拥有作为近邻的共同利益,在坚持中日间4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终究能够通过坦诚的交流和持续的磨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东亚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的合作共赢之路。

革,国力上升,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北洋水师,迫使清王朝乞和、割地、赔款。此后,这个东瀛岛国便以“东亚主宰”自居,成为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灾难的祸首。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跌入谷底。然而,依靠美国庇护,日本很快从废墟中重建,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一坐就是42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GDP总额一直凌驾于中国之上,1990年甚至达到中国的9倍。日本国内普遍存在思维定式,认为中国不可能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

变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20多年里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日本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两国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直至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2013年更与日本形成2比1的态势。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产销量等硬指标都跃居世界第一,将日本甩下了一大截。

对华焦虑恐惧

坦率地说,中国的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并没有将GDP总额超

过日本当一回事。大家很清楚,在人均GDP等指标上中日还有很大差距,没有理由自我陶醉。然而,日本媒体却夸张地将这种变化称作“世纪大逆转”并持续炒作,致使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说到底,日本的对华优越感从甲午战争以来只延续了100年左右,而在2000多年中日交往史上一直是“中强日弱”。这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在中国再次超越它时比其他国家更敏感、更恐惧。

但是,由于中日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足以扭转日本传统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日本的对华反应呈现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盾,以此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日本“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转历史潮流、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这些年日本政坛出现非常诡异的现象:政治家越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就越受欢迎。在一些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口中,更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这一

方面由于日本国民普遍存在对华焦虑感和恐惧感,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容易凝聚人气,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两国综合国力对比还没有出现中国明显压倒日本的态势,是日本与中国博弈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2013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发表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强调“日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的任务就是放眼未来,让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新兴市场”。明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领导人还没有放弃要继续成为世界第二大新兴市场的战略诉求。这不是明摆着要同中国较劲和争斗,试图将中国拉下“老二”位置吗?同年10月,安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而且要在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日本为全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亚洲抗衡中国的力量。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还没有哪位日本首相对中国有过如此充满敌意的表态。除了安倍自身的政治理念外,很大程度是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华焦虑感、恐惧感所致。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日关系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期,直接导火线固然是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但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复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两国处于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重新定位和心理调适的过程中,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出现某种过敏反应。

力量对比逆转

一般来说,崛起的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总会发生对立和冲撞,中日这两个交往了两千多年、有着复杂历史恩怨的国家尤其如此。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东亚很少几个不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公元607年,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中甚至还有过“日出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狂妄言辞。但是,中日间的实力差距总使得日本自惭形秽,甘拜下风。19世纪末,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锐意改

真正敬畏历史 才能“超越历史”



胡令远
复旦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横山宗幸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发现与小时候日本教科书上讲述的不一样,比如有些教科书用“南京事件”而非“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也不是中国说的“30万人”。他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容否认,但由于自己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对历史,“知道但感觉不一样”。在他的朋友里,因为没有经历过,有这样不真切感的人有很多。(对横山宗幸的采访原载于8月7日本报15版)

本精英阶层和大部分老百姓源于战争体验的心理反应。

但是,今天在日本,有以上记忆的人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政者基本上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对于这一代人,那场战争更多是教科书上的简单陈述和数字,或是影像资料中的追叙。历史记忆的弱化乃至缺失,使现实与历史、未来与历史之间的人为割裂日渐扩大。信息社会的发展固然为了解历史提供了更为便利和便捷的技术手段,但如果仅仅只关注现实,丧失对历史的反思与认知,就很难真正把握现实和未来。

此外,在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上,既要有对基本史实的了解,减少无知和误解,更需要有正确的伦理和是非观;既要批判地吸纳本国的历史教育,也有必要去主动了解相关国家的相异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南京大屠杀”确切遇难者数字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史实细节和学术探究。同理,对于慰安妇等其他历史问题,日本也有必要多听听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判断。

众所周知,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大开倒车,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连西方舆论也把他称为“历史修正主义者”。中日关系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他的历史观密切相关。

反省之心消退

今年也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欧美国家也对战一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与大多数战争重视终结纪念不同,对于一战,人们似乎更关注开战纪念,战败方和战胜方都在拷问同样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走上了这条战争的不归路?”“我们原本该做什么,才能避免这场人间浩劫?”

二战之后,客观地说,多数日本国民对战争的侵略性质也有着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但日本的右翼分子把反省历史的看法看作“自虐”行为,肆意否认甚至美化战争。也有的日本政客辩解道,“这是上一辈人的错误”,“我们已经道歉过了,还要我们怎么样”。但究其实质,无

论是与己无关式的责任推卸,还是业已了结式的“完成时心态”,背后既有日本右翼势力有意歪曲历史的原因,也有部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历史反省之心消退的缘故。

实际上,对历史的不断反省,不仅仅针对某一场战争或特定事件,而是将一个民族自身置于历史长河和现实坐标中,不断思考民族及人类命运的一种理性行为。

一战之后,人们也曾经认为将迎来一个和平时代。然而,时隔仅仅二十余年,一场历时更长、规模更大、伤亡更惨重的世界大战接踵而至。国际权力斗争的无情,再一次给人们绝望后的希望上了心酸的一课。“以史为镜”并不仅仅是汲取过去的教训,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某种借鉴,更需要怀有一颗敬畏历史之心,时时警惕和防范历史重演。

理性审视当下

敬畏历史意味着人们需要用历史和理性的眼光审视当下,既要尽己所能减少和排除导致冲突乃至战

乱的肇端,也要未雨绸缪,清醒地认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发事件的“蝴蝶效应”。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而修改和平宪法的行为,即便在日本国内也遭到广泛质疑,即是这种历史观的表现,只可惜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声还不够强劲。

敬畏历史意味着要用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并不因为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或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改变。

近来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中日应“超越历史”的观点,其理由在于,在钓鱼岛问题等一系列历史及现实问题上,中日形成僵局,短期内无法取得共识或谅解。所以他们提出,中日应“超越”或“搁置”特定历史问题,以“重视现实”、“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处理两国关系。

然而从现实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其周边邻国,都远未到接受“超越历史论”的阶段。在相当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与东亚近邻之间缺乏历史共识和战略互信,特别是安倍政权为实现修宪扩军等政治目标,蓄意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上挑衅中国,成为中日关系僵局的症结所在。只有日本政府真正敬畏历史,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中日之间才有“超越历史”的可能。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应该成为中日人民思考未来的财富,一个民族只有敬畏历史,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中日两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基本保持着友好关系,近代以来却战争和冲突不断。如何深入认识和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对破解目前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不无意义。

历史记忆缺失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中日曾经历过一段“蜜月期”,如今50岁左右的一代中国人或许对此仍记忆犹新。而年龄更长一点的一辈人,对1972年中日建交前后很多日本友人致力于两国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也有所耳闻。中日建交既是两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格局判断的产物,也离不开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大部分人对战争的反思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和平与友好的真切渴望。无论是对战争行为的某种忏悔,还是对中国放弃官方赔偿的某种感恩,抑或是基于两者的某种赎罪意识,都是当时日